

■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寻租和 DUP 行动分析

[美] 大卫·柯兰德 编 / 马春文 宋春艳 译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nalysis of Rent-Seeking
and DUP Activities

David C. Colander

長 春 出 版 社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寻租和 DUP 活动分析

[美] 大卫·柯兰德 编

马春文 宋春艳 译

长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美) 柯兰德编; 马春文 宋春艳译。—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5.5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SBN 7—80664—961—1

I. 新... II. ①柯... ②马... ③宋... III. 新古典经济学

IV. F091.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181 号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郝 威

Copyright © 1984 by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with the exceptions of: Chapter 3—Endogenous Tariff Theory: A Survey, copyright © by Stephen P. Magee; Chapter 7—Purchasing Monopoly, copyright © by Harold Demsetz; Chapter 10 — Protection and Rent-See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pyright © by *Kyklos*; and Chapter 12 — The Invisible Foot and the Waste of Nations: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pyright © by William A. Brock and Stephen P. Mage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 邮编: 130061)

(网址: [Http: //www.cccbs.net](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 8563443 发行电话: 8561180

长春大图视听艺术传播公司设计制作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33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秦海

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被不同学者所使用、而不作出严格定义的一个术语，在不同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同^①。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也常常与政治经济学相混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对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之于回忆或期望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的岁月中，所接受的经济教育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一门被称之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

按照经济思想史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或者被称之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据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蒙特克雷蒂恩（Montchretien）在1615年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在英语世界的文献中，詹姆斯·斯图亚特（John Stuart, 1761）是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并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著的书名。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思想传承中，存在着两种相互连接的思想来源：一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另一种面孔是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它们所致力经济学一直被描述为政治经济的科学和经济治理的艺术。前者的目的是描述经济运行，后者的目的是识别治理经济的规律，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政策（Mary S. Morgan, 2001）^②。根据英

①2005年1月8日下午两点，我在撰写这篇总序的时候，从google.com这一常用的搜索引擎上，键入new political economy，仅用了0.23秒就显现了1520万项与“new political economy”相关的条目；如果再键入“新政治经济学”汉文这一词条，搜索所有的中文网页，其相适配的网页也达到17万项。

2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塞耶尔 (Stuart Sayer, 2000) 《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一个总括》一文中的看法, 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 甚至到 20 世纪, 经济学经常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看法, 即经济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 政治因素在决定经济后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 作为丛书的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照塞耶尔的说法, 20 世纪 50~70 年代,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驱动的——至少在局部——为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更加严肃的科学基础的过程中,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确实成为经济分析的重心,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政治约束确实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只不过经常是松散的和不得要领的, 并且在某些文献中, 经常被称之为具有“右”派或“左”派的倾向, 直至肯尼思·阿罗 (Kenneth Arrow, 1963) 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 1958) 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以及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的《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等经典著作出版之后, 政治经济学才有了“新”这一定语。

新政治经济学崛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除了包括上述的人物之外, 按照塞耶尔 (Sayer, 2000) 的说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诺德豪斯 (Nordhaus, 1975) 和希布斯 (Hibbs, 1977) 关于机会主义和政党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凯德兰得和普雷斯科特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 以及巴罗和戈登 (Barro and Gordon, 1983) 关于时间不一致和名誉的理论, 以及滨田和幸 (Hamada, K, 1976)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相互依赖性分析, 斯蒂格勒和波茨纳关于管制的分析以及克鲁格、巴格瓦提、斯尼瓦山、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关于寻租社会的分析等^②。因此, 崛起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 其“新”在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纳入了分析对象, 而且直接与“弗吉尼亚

①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②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关。

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二方面是，旨在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政策的形成经常将经济政策决策看成是一个黑箱，在理性人或者是经济人行为的最优化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或者是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说明性的阐述，政策决策者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他追求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他会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无效率状态进行直接干预，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再扭曲、棘轮效应等等都被舍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优点，起码从读者的立场看，不存在政治学的阴暗面，而且领会不到制度设计的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有助于形成更加技术化的经济分析的风格和模式。实际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制度背景如何，大量存在着“创租”和寻租的行为，一种政策的后果经常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之外。打开政策形成的“黑箱”不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可能是“叶公好龙”或者是政策形成过程本身所内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新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年代，根据旅美以色列经济学家艾伦·德拉正（Allen Drazen, 2000）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当今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不仅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经济学的一般领域都是如此”。^①在这里，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动研究”，尽管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含糊的定义，但是，它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因此，从德拉正的观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公共金融、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因为它关注的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在一个社会中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而社会被定义为不仅包括特定主权的国家，而且包含了具有一定管辖权的组织，比如企业、社群或其他的组织。从这一点上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纳入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而且可以对一些特殊的概念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权力”、“权威”等

① Allan Draz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等。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权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权威,也就成了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明显地或者默认地认可某个人为他们在某些行动领域做出决策的状态。信息、知识、激励等理论这些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所获取的革命性发现也就被纳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包括了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度量、新闻自由、人权、法院的独立性、产权保护、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透明度、犯罪、腐败以及社会和政治暴力、政治不稳定等等方面的研究主题(Sayer, 2000)。^①

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思想史中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科学的突破。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创立了《新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其创刊词写道:“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新世界需要新科学。从现代的意义上看,新世界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构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接着这份创刊词继续写道,“理解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便为清除智识上的障碍做好准备,并需要把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度和睿智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进展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20世纪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按照“两分法”展开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国家与经济、经济行为者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公共领域看,或者说在政治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就是国家;在私人领域,或者说在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就是市场。新政治经济学把这些“分离”的两者融汇了起来。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处,就是它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能够得到一致性的认同。约翰·道巴克和约翰·奈耶(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1997)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的入选论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且在前言中,他们也指出,交易成本与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

^①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背景)、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性论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所进行的理性决策研究(Jam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甚至干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莫西·拜斯莱(Timothy Besley)在2004年10月13日英国科学院的凯恩斯经济学讲座所作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一些场合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暗示,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①20世纪经济学范式的履新、分析工具的进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能力,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回应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就正如贝斯莱所言,“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并因而强化它的相关性的学说”。就编辑这套丛书而言,我们的主张是,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学生以及对社会生活怀着强烈求真欲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政治行为、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冲突和摩擦以及在各个层面所洋溢着的热情,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所在。

2005年1月10日·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Alt, James A.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 edit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ley, Timothy(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① Besley, Timothy (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6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Blinder, Alan S. (1999):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or Does 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pril 23, 1999.

Drazen, All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obak, John N. and John V. C. Nye, 1997, edit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rde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Sayer, 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平新乔、莫扶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统一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陈光金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鸣 谢

与大多数著作相比，本书更是团体努力的结果。1983年四月，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召开了克里斯蒂安·A·约翰逊经济事务会议（Christian A. Johnson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ffairs），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最初就是提交给这次会议的。没有这次会议就没有这本书，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和支持者。克里斯蒂安·A·约翰逊基金会的主席维尔蒙特·基特（Wilmont Kidd）夫人，是应该最先感谢的几位之一。没有基金会，不仅会议不可能召开，我也不可能留在米德尔伯里。可以说，这次会议对米德尔伯里学院是有很多好处的，我希望我在该学院的工作也能如此。基特夫人和基金会不仅提供了财务支持，还强烈地关注着米德尔伯里的事务和会议的成功。为此，我本人、经济学系和整个米德尔伯里社区都由衷地感谢她。

组织一次会议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没有许多人的大力支持，会议是组织不起来的。经济系的秘书茜拉·凯辛（Sheila Cassin）和会议中心的主任珍妮特·弗洛里（Janet Flory）起到了特别的作用。没有她们，会议只能是混乱不堪的。

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不仅仅是对会议论文的重印。出版者不允许这样做，我本人也不愿这样做。为了使论文互相配合并互相补充，大多数论文都做了大量修改。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参与本项工作的人。



2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当你像我一样令作者痛苦时，你需要有同伙，我有许多同伙。我在米德尔伯里举办的高级研讨班的成员大力批评了这些论文。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我感谢他们。

除了研讨班的成员外，其他人也起了作用，包括：两个匿名评审人，他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鲍灵格 (Ballinger) 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卡洛尔·弗朗克 (Carol Franco)；辛西娅·因苏利奥·本恩 (Cynthia Insolio Benn) 和戴弗·巴伯 (Dave Barber)。除了鲍灵格出版公司的有关人员，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瑞芙 (Helen Reiff)，她帮助编辑、组织了本书。当然，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但出版者告诉我序言不能写成一本书。

大卫·柯兰德
佛蒙特 米德尔伯里
1984年4月

导 论

“寻租”^①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以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②。

①对“寻租”一词的译法，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寻租’一词来自英文的 rent-seeking，意思是找窍门，钻空子求利。与中国平常的‘租’字含义无关。”（叔达：《“寻租”与“菜单”》《读书》1998年第12期，第101页）。此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rent-seeking 确实可译为“找窍门”或“钻空子”，然而“寻租”理论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是以“租”的经济学定义为基础的。如果译成“找窍门”或“钻空子”，虽然通俗，却是割裂了文献。——译者注

②中译文见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3-14页。——译者注

2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这段话也许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它是“看不见的手”定理的基础，而这一定理又是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放手让经济运行，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之间的竞争会引导它走上正确方向。但亚当·斯密也说过：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①

这段话显示了经济过程的另一面——看不见的手似乎不发挥作用的一面。自行其事，不受干涉的个人在被称为“寻租”的过程中不断逃避竞争。寻租有许多其他的叫法——卡特尔化、垄断化或 DUP（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寻求非直接生产性利润）活动。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斯蒂芬·迈吉（Stephen Magee）将后一方面的人类行为精辟地称为“看不见的脚”。如果我们采用这一类比，竞争可以看成是一个看不见的脚践踏看不见的手的游戏。

传统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集中考察了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方面，优雅地解释了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知不觉地为社会目标服务的条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1980：第 127 页）在评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时，曾有过如下说法：

[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留在那里。

回应着这种评价，经济学家的研究纲领已发生了演变，成为

①前引书，第 122 页。——译者注

一种探索更广泛含义的研究纲领——不仅研究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情况，也研究它不发挥作用的情况和不发挥作用的原因。本书各章是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研究纲领的组成部分。

个人企图逃避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为其自身利益改变政策建议方向，新研究纲领是关于这种企图的分析。传统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假定政府是一种外生的力量，总是要做好事；而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认为，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内生的，它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将反映社会上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

我们可以通过新旧分析对市场不均衡的可能影响的看法来看它们之间的不同。传统的新古典分析告诉我们，只要有过度供给，价格便会下降；只要有过度需求，价格就会上升。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除此以外，为了获得或保持租金，个人将会组织起来，阻止价格上升或下降。这是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只有同时考虑这两种活动，我们才能理解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传统新古典经济分析假定了一组特定的完全竞争制度。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家质疑“完全竞争均衡”的稳定性。要保证其稳定性，所有个人都必须被动地接受作为完全竞争均衡基础的制度和政府政策。然而，如果改变制度的边际收益小于保持它的边际收益^①，竞争均衡将是不稳定的，即使它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

新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关于组织成本的合理假定之下，我们预计，在一系列的市场中，竞争均衡将逐渐变化为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在完全竞争的边际，保护竞争均衡的动力通常很弱，来自卡特尔化的潜在租金数量很大。因此，即使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大多数社会也不会选择竞争均衡。由于这一原因，完全竞争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范式。

①原文如此，“小于”似乎为“大于”之误。——译者注

4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上述观点并不新鲜。但令人吃惊的是，按照逻辑出现的下一个问题——什么类型的均衡将会出现？却从未被正式讨论过。本书就是要讨论这一问题。

寻租分析的历史

经济学家对寻租活动的非正式关注已持续了很久。古典经济学家的竞争观就有寻租的色彩。在他们看来，个人总是试图建立垄断，在垄断时，这些人创造了准租金或垄断利润。分享这些租金的欲望使另一些人进入该行业，使价格下降到即使不是达到完全竞争水平，至少是接近完全竞争水平的水平。对古典经济学来说，竞争均衡是一种动态均衡，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对垄断的建立也有对垄断的瓦解。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一般却都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这一政策不是直接源于他们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政府目标和效能的经验判断为基础的。在他们看来，政府首先是个人用以建立和保持垄断的一种工具。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竞争过程将运行良好。如果政府不染指竞争过程，竞争总会发挥作用。在他们看来，政府干预通常会使状况变坏。

彼尔洛·斯拉法（Pierro Sraffa）1926年的文章《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质疑了古典经济学家垄断自我限制的观点，为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创新奠定了基础。斯拉法认为，在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存在走向垄断或单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趋势。单个企业一旦建立了对某一行业的控制，该企业便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为基础有效地保护其垄断地位，即使没有政府对垄断的保护，新企业要进入该行业也是困难的。竞争过程即使最终发挥作用，也不会足够快地发挥作用。斯拉法看到的显然不是古典理论家心目中的动态竞争形式。

作为对斯拉法论文的回答，雅各·维纳（Jacob Viner）（1931）改造了成本曲线分析，区分了服从收益递减规律的短期成本曲线和由规模经济制约的长期成本曲线，试图以此回避斯拉法的批评，让长期的归长期。同时，竞争概念也从“竞争过程”观点演变成了更形式化的完全竞争观点^①。随着这种转变，经济学家不再追问竞争过程中的“最终”是否足够快这一难对付的问题，转而精心打磨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

罗宾逊（Robinson）（1933）和张伯伦（Chamberlain）（1933）将垄断和竞争概念综合起来的尝试没有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完全竞争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对效率、福利和一般均衡的仔细推敲。这些推敲工作优雅地显示了完全竞争市场如何导致“最优结果”。结果是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所说的“一个乌有世界的天体力学”。

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接受完全竞争模型适用性的局限性，但它仍然是主流经济模型的中心，扮演着福利讨论的参照点和分析框架的双重角色。这一模型当然有许多批评者。奥地利学派批评新古典模型未能考虑竞争过程和企业家的作用；后凯恩斯学派批评这一模型未能引入对时间的分析、未能对公司活动做出合理的假定；制度主义者批评该模型未能明确讨论个人活动的制度结构；博弈论理论家批评该模型狭隘的均衡概念；而公共选择理论家批评该模型未考虑经济人的政治行为。

尽管对传统的新古典模型有无数的不满，但这一模型还是活了下来，甚至被发扬光大了。偏离竞争的福利损失的估计值被证明很小（GNP 总量的 0.5%或 1%），小到了一个愤世嫉俗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对这么小的损失如此大费周章，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只是耸耸肩膀说：它也许不符合实际，但它很漂亮。实际上，愤

①关于这种发展的讨论，见 George Stigler（1957）。——原注

6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世嫉俗者没有提这个问题。罗伯特·蒙德尔（Robert Mundell）的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除非对作为这些研究（垄断造成的损失）基础的工具的有效性做全面的理论考察……有人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说经济学已经不重要了。”（1962，第 622 页）。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7）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反应，他的回答多少有些含糊，但不论怎样，却是发人深省的：由垄断、关税和税收造成的损失比通常计算的数值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哈勃格（Harberger）三角，还包括全部数量的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他的推理如下：个人会为获得租金而竞争或为获得收益而游说，而且（假定寻租是竞争性的）每一个人会使他的支出等于全部数量的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与他获得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的概率的乘积。在这一点之前，支出就是有价值的。他认为，合起来，个人竞争将使全部租金或利润消失。图洛克的这篇文章开创了一个研究派别，或许可称为寻租分析的公共选择分支，许多有关文章被收入 1980 年出版的一部文集——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和戈登·图洛克编选的《一种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①。

两个中心思想贯穿这一公共选择文献的大部分：首先，寻租主要是通过政治过程出现的；第二，限制寻租的最好办法是限制政府。因此，它与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的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是对监管^②的公共选择分析的自然延伸。

公共选择文献对寻租思想的兴趣不是独一无二的。1974 年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研究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似乎没有增长的问题。她的观点与图洛克相似，但她用一个更正式的模型

①对公共选择寻租文献的出色评论见 Robert Tollison（1982）。——原注

②监管，又译管制、规制，各有优劣，此处按个人偏好译为监管。——译者注